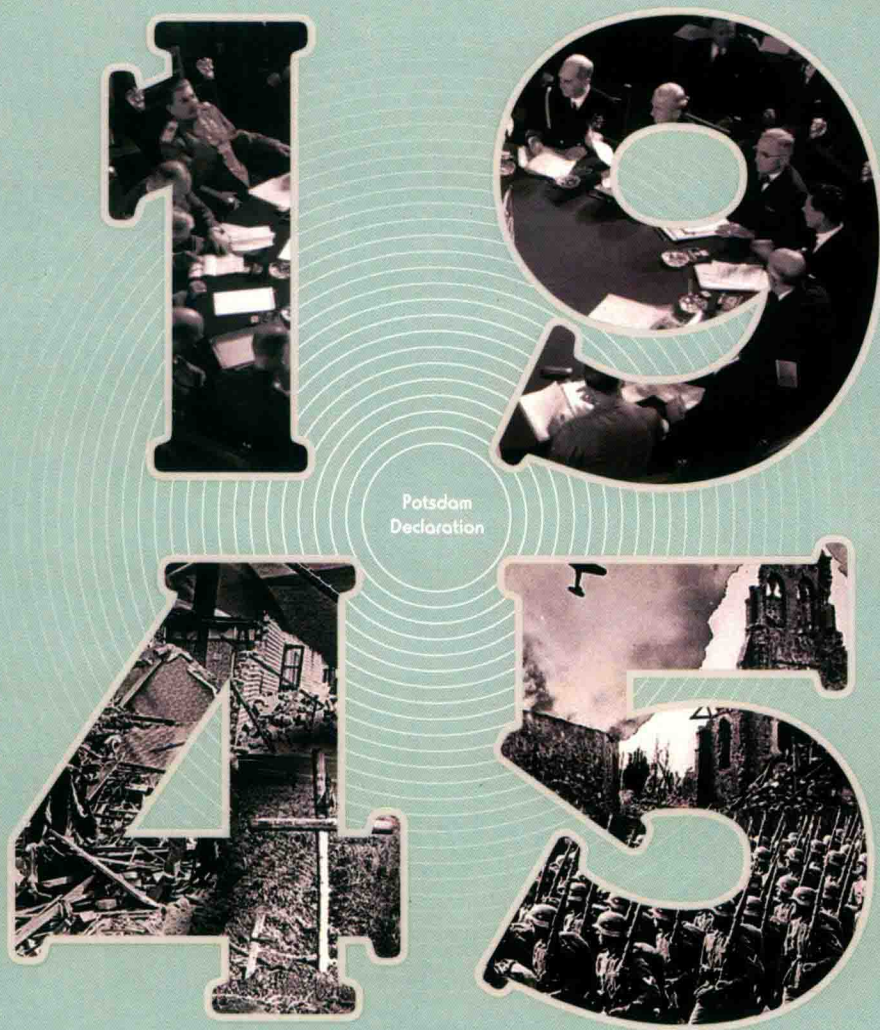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Remaking of Europe



Potsdam
Declaration

[美] 迈克尔·内伯格——著
宋世锋——译

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历史系教授、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协会主席
深度揭秘——二战后期大国明暗博弈与战后世界格局形成根源

精英史料×全新史观×专注细节

Michael Neiberg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精英天经 CS BOOKY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Remaking of Europe*

1945

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

Michael Neiberg

[美] 迈克尔·内伯格——著
宋世锋——译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 /（美）迈克尔·内伯格著；宋世锋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139-2068-1

I. ①1… II. ①迈… ②宋… III. ①波茨坦会议（1945）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42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2738

POTSDA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Remaking of Europe by Michael Neiberg

Copyright © 2015 by Michael Neiber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y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

1945:DAGUO BOYI XIA DE SHIJIE ZHIXU XIN GEJU

出 版 人	李声笑
著 者	〔美〕迈克尔·内伯格
译 者	宋世锋
责任编辑	王 倩
监 制	于向勇 秦 青
选题策划	森欣文化
特约编辑	康晓硕
营销编辑	刘晓晨 刘 迪 初 晨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封面图片	视觉中国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2068-1
定 价	52.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读
行
者

从阅读走进现实

从阅读走进现实



knowledge-power

读行者

目 录

CONTENTS



001	引 子
015	第一章 走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
039	第二章 打出一个二连击，直中俄国人下颚
063	第三章 和俄国打交道，“一匹马你得买两回”
083	第四章 这场战争的结束，可能会比上一次还要令人失望
105	第五章 走向波茨坦
129	第六章 柏林街道，有一种死亡的味道

目 录

CONTENTS



155	第七章	大国并不想恢复战前世界
181	第八章	两天的休会，成为巨大的转折点
201	第九章	自利的仁慈与复仇的欲望
223	第十章	波兰的命运
247	第十一章	东亚的前途问题
268	结 论	
278	致 谢	

引 子

对于世界大多数地方来说，《凡尔赛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就在那一天，一位美军上尉漫步在家乡教堂的走廊里，与心爱的姑娘永结连理。尽管他在战争中表现突出，证明了自己作为战场领袖的能力，不过他并不想以军事作为职业。此时此刻，他也没有对进入世界政坛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渴望。他和另一位参战老兵签下一份租约，准备开一家男装店。战争已经结束，他希望未来能把时间放在家人和事业上，而不是用于战争。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一天，他考虑的不会是战争和结束战争的那个和平条约。

那一天在大西洋对岸，一位很有争议的英国政治家正在享受东山再起的欢愉。就在前几年，他蒙受羞辱，被排挤出政府，如今他身兼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两个要职，对英国的国防政策拥有显著影响。他对战后世界感到焦虑，并且担心苏联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扩散，因此鼓吹英国、美国和日本军队采取联合行动，在俄罗斯北部登陆，在俄罗斯的内战中支持亲沙皇的“白俄”。他不喜欢《凡尔赛和约》，称它是“荒唐和畸形”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这个和约对德国削弱太多。他担心一个遭到肢解的

德国会在欧洲造成权力真空，布尔什维克可能寻机填充。他想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认为签订《凡尔赛和约》错失了重塑战后世界的机会。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就开始呼吁对这个和约进行重大修订，以维护德国的利益，因为它对德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在欧洲大陆上，只有德国才有可能制衡更为危险的俄罗斯。当他获得拟定战后和约的机会时，将主张不能把《凡尔赛和约》当成典范。

当时正在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中搏斗的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凡尔赛和约》。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热情已经受到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诅咒，他们在 1918 年 3 月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向其屈服，在外交上进一步受到隔离。布尔什维克向德国投降后，德国获得在法国发动春季攻势的资源，几乎在那一年赢得战争。因此在德国投降后，战胜者们认为没有必要邀请布尔什维克政权到巴黎参加和谈。对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来说——包括新获任命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凡尔赛和约》的相关问题和他们正与保皇派白军进行的生死斗争相比无足轻重，和约中只有组建新的波兰直接影响到他们。然而，这位野心勃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对西方协约国支持白军的动作极为关注，他特别提到西方领袖们曾经说过的“扼杀在摇篮里”的威胁。多年以后，在新的战争造就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将有机会与说出这一话语的那个人见面，并且斩钉截铁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在这三个人中，有两人分别是英国陆军和空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苏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瑟夫·斯大林，他们很可能已经预见到自己有一天将在战争与和平期间领导自己的国家。这两个人都认识到在巴黎谈判出来的新和平很脆弱，预言欧洲的和平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丘吉尔和斯大林都极具雄心，而且与本国的权力中枢极为接近，他们知道仅凭

一个和约，解决不了自 1914 年那个不幸的夏天开始的致命的全球冲突所存在的核心问题。他们在 1919 年可能都认为，在下一场战争中他们将结成肩并肩的盟友共同作战的想法是滑稽的，尽管他们有生以来已经见惯了极端的变化，或许没有能再吓到他们。

第三个人是哈里·杜鲁门上尉，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国家在终结下一场战争时，他将统领的不是一支炮兵部队，而是整个国家。“到底谁是哈里·杜鲁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参谋长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海军上将听到民主党在 1944 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选为罗斯福的副总统候选人后这样问道。杜鲁门只拿过高中文凭，在外交方面没有经验，他从一个失败的商人一跃而成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史上留下一道最奇异的轨迹。此外，当杜鲁门于 1945 年 7 月在柏林美丽的郊区波茨坦首次会见丘吉尔和斯大林时，知道他必须替代被自己形容为“不可替代”的那个人。他也知道，在处理战时政策的大多数关键问题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几乎都将他完全撇开。杜鲁门的政治生涯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不幸且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即将遇到的艰巨任务毫无准备。他甚至自 1919 年从法国战场上回国后，还没有再次离开过美国。

这三位同盟国领袖及其幕僚面对的任务就是让欧洲恢复和平和稳定，自从 1914 年的灾变以来，它们已经成为奢望。这三个人及其顾问的世界观都形成于 1914—1918 年的战争考验中。对斯大林来说，俄国革命和血腥的内战直接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进一步证明，从战争转向和平所遇到的挑战不比战场上的挑战少。如果波茨坦三巨头像凡尔赛三巨头一样遇到失败，那么欧洲未来无法得到和平，只能收获新的冲突、死亡和更多的战争。

这三个人从战略利益和本国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经验出发，对于战后的看法各有不同。那些年月，见惯了令人震惊的革命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了欧洲最强大的王朝，致使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控制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未来而争斗不息。第二次世界大战除掉了法西斯主义，不过也使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传统强国濒临崩溃。英国虽然名义上也是战争的伟大胜利者之一，也处在破产的边缘，即刻面临着失去维持其大国地位的帝国的危险。如今美国和苏联取代了欧洲传统列强，前者自 1919 年以后曾经在相当程度上疏离了欧洲，1945 年时还存在着这样做的可能性；后者作为一个刚刚从血腥的战争中凯旋的革命政权，对一些国家来说是可怕的噩梦，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则带来了诱人的未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欧洲的未来都不再专属于西欧国家掌握，他们甚至连主角也当不了。

这些人在 1945 年 7 月聚集到波茨坦，要把破碎的世界拼凑起来，在他们心中，1945 年终结的这场战争并非开始于 1939 年，而是源自 1914 年。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Sir Anthony Eden）和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等人都说，两场世界大战不是独立的，而是一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这种观念有着悠久传统，英国著名战地记者查尔斯·雷平顿（Charles Repington）恰当地把他在 1920 年出版的畅销书命名为《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他在该书中提出，始自 1914 年的全球性纠葛不会因《凡尔赛和约》而消失；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完全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世界性大战。美国军人亚历山大·克莱（Alexander Clay）也与雷平顿有着共鸣，当他在战后代表两方军人发表评论时说：“我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预言，在 25 到 50 年内，这场战争会再

次打响。因为我们预感到，它没有完全得到应有的处置。”

这场 30 年战争不仅包含了两次列强之间的世界大战，随着旧秩序在 1914 年解体，还涉及很多国内战争和地区性战争。正如波茨坦会议结束后威廉·莱希海军上将在日记中所说，“这意味着世界大战彻底终结，这场战争自 1914 年开始，1918 年到 1939 年只是为了进行深入备战而暂时休战，如今终于结束了”。由于发生了俄波战争（1919—1921）和西班牙内战（1936—1939），欧洲人不像莱希那样认为中间 20 年是休战，然而波茨坦的政治家们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历史，知道 1945 年面对的灾难并非源于德国 1939 年入侵波兰，而是始自 1914 年在波斯尼亚一个偏僻城市的街角上发生的刺杀一个相对不甚重要的大公的行动。

代表们汇聚到风景如画的波茨坦采琪莲霍夫宫（Cecilienhof Palace），与宫中游荡的幽灵共处一室。这座宫殿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本来是德国王储及其王妃的度假地，战后时刻提醒着政治家不要忘记以前的失败。德国人坚信很快就能取胜，他们在建造这座宫殿的同时，还投入巨大资源打了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世界大战。王储在战前是最为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分子之一，曾在西线战场领导一个集团军群。他从未有机会入住这座宫殿，在致命 1914 年夏季之前，这个曾经强大无比的政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似乎能永传万代，如今该宫殿只是让人们回忆起它的傲慢。30 年过去了，现在德国根本没有了政府，只能听凭从前的敌人发落。

与凡尔赛宫里的幽灵相比，采琪莲霍夫宫的幽灵是小巫见大巫。每一个到波茨坦参加会议的人都把《凡尔赛和约》视为未能缔结和平的恐怖的历史警告。他们都相信，1919 年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战争在 20 年后爆发。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极为敬仰这个和约的创造者伍德罗·威尔

逊，杜鲁门就站在威尔逊的画像下面宣誓就职。然而，杜鲁门认为这个和约是威尔逊的最大失败，他在波茨坦会议开幕时提醒其他政治家们说，《凡尔赛和约》制造出“很多漏洞”，警告与会代表们要吸取那些经验教训，否则就可能重复历史。对于杜鲁门的这一观点，没有人表示异议；这位总统不需要提醒，其他两位领袖也都明白，如果他们不多做一些工作，以后必须付出无尽的代价才能防止凡尔赛的灾难重演。

当几代人商讨终结灾难性的世界大战时，欧洲的政治家们第二次聚集到一起，这足以证明《凡尔赛和约》毫无作用。在那个夏天，来到波茨坦的每个人似乎都批评过该和约及媾和的程序。在一些人看来，问题出在程序本身。《凡尔赛和约》是在一系列尴尬的妥协、交易和误解中产生的，不过一旦落实到纸面上，就成为具有效力的国际协议，甚至大多数观察家和与会者都能看到这个和约与生俱来的缺点。因此，很多政治家 1945 年来到波茨坦时，希望会议的作用不是制定有着具体政策的最终条约，因为这样的条约以后还是得由他们或他们的继承者负责，他们希望会议能成为“三巨头”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为公平与和平的未来的象征。

此外，《凡尔赛和约》的数个原则到 1945 年已经破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1919 年，列强为了使政治和种族边界相适应而做出的努力基本上是无效的，他们调整边界没有收获和平，反而刺激出新一轮的领土收复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一再引发危机。早在 1939 年 9 月 9 日，即欧洲开始进入战争之前一个星期，英国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就认为，民族自决原则“是一个错误”，英国获得编辑们已经预言的胜利之后，无法利用它来指导和平进程。一般来说，他们的立场反映的是已经存在

的看法；因此，民族自决原则在 1919 年的和谈时虽然是一个基石，在 1945 年却发挥不了太大作用。

英国外交部在 1943 年所写的一份评估对《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个基石——即国际联盟——也提出质疑。该文件没有对建立国际组织本身提出异议，但它断定未来成立的任何组织都不应该追随国联的民主模式。相反，大国应该进行直接掌管。按英国外交部的估计，既然只有三到四个大国能幸存到战争结束（美国、英国、苏联，或许还有中国），设计新的国际机构应该反映出他们的利益。因此，“不能再允许”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入大国行列”。这几个国家和其他小的地区强国一样，只能通过大国牢牢掌握的国际机构确保未来的安全需要。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他向美国特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说，“两次世界大战都始于小国”。除了后来破例提升了法国的地位，这里可以看到以后变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心观念。

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代表们基本上都忘记了参议院在 1919 年拒绝《凡尔赛和约》时陈述的理由，当时美国的参议员们关心的是美国外交活动的自由会受到威胁。到 1945 年，美国人几乎都不记得或关心那些显然已经久远的争议。在波茨坦的美国外交官看来，那个和约的最大漏洞出现在财政方面，迫使美国不情愿地背上德国赔偿的负担，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回报，也无法为持久的和平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帮助。相反，那些决定为全球性经济萧条创造了条件，由此导致纳粹党的崛起和战争在 1939 年爆发。

然而，少数 1919 年的思想的确延续了下来。比如条约应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不直接参与，就反映了凡尔赛会议的思想，这在波茨坦会议的安排中很明显。被占领的德国没有代表；意大利也没有；法国和波

兰虽然有异议，认为自己处在胜利的一方，理应派出代表，但也是这样的待遇，因为三巨头不同意。波茨坦会议和凡尔赛会议一样，是胜利者的和平，再次由大国书写。

英国外交部的那份文件也包含了一个在 1943 年中期传阅的一个调查报告，内容是关于凡尔赛和会所犯的错误。这个很有见解的评估警告说，战争结束后的情况“与 1918 年时会有极大不同”。它预计德国受到的敌意要比 1918 年时还要强烈得多，并注意到这一次俄国人肯定会在设定和平条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法国不太有这个可能。与 1919 年时不同，同盟国在 1945 年需要占领整个德国，并与德国官员一道工作，哪怕——或者特别因为——这个国家不再存在政府。尽管纳粹政权投降了，会议的策划者们也不能保证德国游击队不会继续抵抗。此外，战争在欧洲结束后，与日本的战争还在持续，这意味着同盟国在长期占领和重建德国方面肯定只能投入有限的资源。最后，这份文件提到，对德国立刻进行救济和长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两项任务可能会比 1918—1919 年时艰巨很多倍。

尽管英国外交部注意到，“想预测事件如何演变是不可能的，因为未知因素太多了”，它的分析非同一般，指出了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他们批评凡尔赛和会时，指出其失败的经济机制恰恰摧毁了大国在 1919 年努力想重建的欧洲经济。他们也批评了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迎合反复无常的英国舆论，对于德国的处置太过严厉，而美国没有批准和约，“对其执行造成致命影响”。这一次，英国外交部认为，英国政府必须至少确保得到美国的合作，为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逼迫德国人承认他们的彻底失败；能把俄国人往东挡多远就挡多远。

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西方政治家们竭尽全力，避免陷入回顾 1919 年

时都看到的那场灾难。那时的人们没能为持久和平创造出条件，1945年的与会者想建立一个稳定与繁荣的欧洲。然而他们无法躲避凡尔赛会议留下的长长的阴影。他们不管在波茨坦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放心地告诉他们自己及其民众，他们没再重复 1919 年的错误。

然而，还有第三个幽灵在 1945 年夏季回荡于波茨坦的别墅和宫殿里，那就是 1938 年慕尼黑会议的绥靖幽灵。很多美国和英国外交官已经开始认为苏联的行为是在重复 1930 年代德国的侵略性行径，苏联极度有选择地执行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更让他们感到警觉。他们以慕尼黑为前例，反对向俄国人（或者就此而言还有日本人）做出让步，立即让人想起 1933 年到 1939 年那段时间的恐怖和失败。慕尼黑的例子是一个有力的提醒，使人意识到绥靖的代价，对于相信这种类比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战争刚一结束，美国人与英国人在与俄罗斯人的交往中，就要使用更强硬的手段。

不管这些幽灵对于世界在 1945 年面对的问题是否有关联，波茨坦的与会者们都无法回避。政治家们在 1945 年做出的几乎每个决定都映照着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与 1938 年的慕尼黑协议所象征的绥靖等事件。而这些事件并不久远。1919 年时的那些人有时候利用对 1815 年维也纳会议模糊的历史理解作为粗略指导，而在波茨坦参加会议、出席正式晚宴和社交活动的每个人与先前那些人都不一样，他们都亲眼看见了 1914—1939 年间发生的残酷事件，有些人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温斯顿·丘吉尔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强烈反对其政策的绥靖倾向，到波茨坦参加会议的英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慕尼黑的幽灵尤其萦绕于波茨坦的会堂中，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扩张幽灵并无二致。

新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曾经在1919年作为威尔逊总统的低级顾问参加过巴黎和会，他或许就是说服威尔逊去巴黎开会的那个人。伯恩斯也觉察到过去的幽灵压在来到波茨坦的人们心中。伯恩斯断定，美国代表团犯了两个致命错误。首先，威尔逊总统拒绝任何共和党参议员随同他一起参加巴黎和会，因此导致和约在参议院遇阻。伯恩斯在众议院服务了14年，在参议院工作了10年，他向国会两院保证会及时通报波茨坦会议遇到的问题和正在进行的讨论。其次，他认为美国为了在战后解决欧洲的经济问题做出太多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德国赔偿进行经济支持。他相信，这个错误促使经济和政治陷入动荡，导致大萧条的发生。

因此，萦绕在波茨坦会议各代表团心头的幽灵似乎不像是来自遥远过去的警告，而是他们在有生之年现时决定的结果。俄国人也感觉到了它们，尽管他们没有参加过巴黎和会。于是在波茨坦会议开始的两个月之前，即1945年5月，斯大林警告杜鲁门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说，他希望在即将与杜鲁门和丘吉尔一同召开的会议上避免凡尔赛模式，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他在那个模式中看到的具体问题。然而，斯大林在其他场合曾向另一位美国人表示，不管三巨头在波茨坦达成了什么协议，他都担心美国参议院会予以拒绝，就像1920年拒绝《凡尔赛和约》那样。约瑟夫·斯大林不了解美国参议院，不管他与杜鲁门达成什么协议，该机构的活动都使这位苏联领袖疑惑是否靠得住。

本书的目的远非叙述政治家们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互相说了什么话，与此前关于这次会议的两种历史不同，本书有意避免“当时杜鲁门对斯大林说”之类的波茨坦会议日常活动记述。实际上，我利用在波茨坦举